



默默耕耘半世紀

涂繼正、李宜華

記父親涂羽卿博士的一生

編者按：涂羽卿博士（1895-1975），物理學家，曾任聖約翰大學校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也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本文由現居美國紐約的涂氏兒媳涂繼正及李宜華撰寫，讓我們對這位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一生有更全面的認識。誠如他們所言，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苦難，而是千千萬萬忠心耿耿、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我們民族慘痛的歷史教訓。」由於篇幅關係，本文刪減了近半內容，欲閱讀全文者，可參本宗文社網址。

負笈渡洋

1914年8月，一艘遠洋客輪從上海黃浦江碼頭啟航，駛向大西洋彼岸。甲板上，十多位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合影留念，其中有以後成為中國傑出的教育家陳鶴琴、陶行知，還有父親涂羽卿。他一生奉獻給中國的教育事業，那年，他還未滿十九歲。這張珍貴的照片至今保留在陶行知先生的紀念館內。

父親先入讀美國康奈狄克州衛斯理大學，後唸麻省理工學院，主攻土木工程，於1918年6月獲碩士學位。此後他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同時在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當實習設計員。1919年回國。

父親原名涂自習，1895年生于湖北漢陽，祖籍湖北黃岡。他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裡，從小受了洗禮。祖父涂松山是循道公會（Methodist Church）牧師，他有一個比他年長一歲的哥哥，名自學；兩個妹妹年幼夭折；還有一個比他小十六歲的弟弟，名自謙。他們自幼家境

貧寒。小學和初中時，他和長兄在漢陽的教會學校就讀。1906年，祖父把他們送到武昌的博文書院就讀。他天資過人，勤奮好學，年年名列前茅。1911年，在他中學畢業前一年，武昌起義，革命烈火燃遍中華大地，也燃燒在有志青年的胸膛。父親當時年方十六，一心貢獻國家。

1912年，他中學畢業後，留校擔任英文教師。及後放棄教師一職，投考北京清華學校。¹ 1913年，他先經湖北省初試保送進京，又通過清華學校在北京宣武門內學部舉行的入學復試，於當年九月入學。他的學習成績非常突出，尤其是英語水平超優，入讀清華學校一年後就畢業了。1914年，他告別父老鄉親，負笈渡洋。

父親在留美時期保持了自幼以來一貫的優異成績，同時積極參與學生組織的各種活動。在五年的留美生活中，他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華，科學、民主是他嚮往和追求的目標。

學成歸來

1919年9月，父親結束了在美國的工作，國內已為這些留美學生安排了工作。那時他剛和母親Muriel Hoopes結婚，但急於回國報到，暫別妻子，先行回國。父親學成歸來，躊躇滿志。他先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任教。沒有教育，人們就不會懂得民主與科學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他們是以教育救國為主導思想的一代愛國青年。1925年，政府決定在南京修建中山陵。父親和其他工程人員承擔了修築市內通往中山陵的林蔭大道。這是他回國後參與的第一項工程，也是唯一的一項工程。他一生的心血奉獻給了他最熱愛的事業——中國的教育事業。

良師益友

父親治學嚴謹，對學生循循善誘，關懷備至。他認為，為師之道不僅在於傳授知識，而且在於教育青年為人之道。他常以自己做人的原則教育學生：「以光明磊落為幟，以追求真理為標；創導科學精神，探索科學價值；貢獻於社會，造福於人類和平」。他幾十年在教育園地的耕耘，收穫了桃李滿天下，許多他的學生日後在科技界、教育界做出卓越的貢獻。前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八一三」日寇佔領上海。滬江大學地處楊樹浦，瀕臨黃浦江，先被日軍佔領。八月十二日傍晚，父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年幼的孩子，連夜逃到上海法租界裡。學校停課了，許多學生紛紛離開上海淪陷區。上海幾所教會大學校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就聯合起來，租了南京東路慈淑大樓繼續開課。他每天從滬西我們的家擠電車到南京東路教課。這樣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

約園風暴

1946年6月，父親在滬江大學任職十九年之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聘他為副總幹事。他打算離開教學崗位，專任青年會的副總幹事的職務。事情尚未落實，十月間，顏惠慶博士代表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來請父親出任校長的職務。顏博士認為父親擔任教學工作有二十七年之久，繼續做教育工作比青年會工作更為合適。當時華東幾所教會大學正在醞釀組織聯合大學，而父親對這項計劃，一向抱積極的態度，認為要辦好一所真正的好大學，必須集中人力和物力才能見效。與此同時，他感到：門戶之見很深的聖公會居然要他這個既不是聖公會成員，又不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校友去當校長，說明一向保守的聖公會有了開明的傾向。在不太了解該校內部複雜關係的情況下，他接

受了這項任命。

當時聖約翰大學由美國聖公會上海教區直接控制，實行的是主教制。主教掌握校內一切大權：組織、財政、宗教事務、擁有正副校長任免權等最後的發言權；而校董會、校務委員會只有諮詢、建議和管理具體行政事務有限的職能。一切重大的事情非經主教批准不可。聖約翰大學之所以長期不在政府部門立案，就是因為主教始終不同意。

1946年11月，父親正式就職，按聖約翰大學的傳統，就職典禮很隆重。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席了典禮。顏惠慶博士代表校董會把紅綢裏著的學校大印交給了涂校長。其實紅綢內是隻空盒子而無實權。父親就職之後，在他的面前，的確不是玫瑰花壇，不是芳草綠茵，而是一條崎嶇的道路。他上任後，矛盾和衝突接踵而來。

他熱愛教學工作，當了校長，並沒有脫離教學。在繁忙的校務工作外，還教一年級和四年級的物理課。一年級是打基礎，四年級是畢業班。他倡議建立每週一次學生集會制度，經常親自主持，向學生傳達校政措施，教導學生勤修品學。他對學生非常關心，經常了解學生生活和學習的情況。在行政工作方面，他建議：整修思頤堂的中國教員宿舍；開設女生宿舍；開放學生課外活動；恢復*St. John's Dial*英文週刊；將交誼廳底層大廳改為禮堂和各學會辦公之用；照董事會的決定，學校向政府立案註冊，這對歷史悠久的聖約翰大學來說是件大事。在他任內，立案工作終於順利地完成。他以淵博的學識、卓越的才華和儒雅的風度獲得師生的尊敬。他說話多少帶有一點湖北鄉音，但一口流暢的英語，令人欽佩。

為成立華東基督教聯合大學事宜，他經常要和杭州之江大學校長黎照寰、蘇州東吳大學校長楊永清商討並研究。這三所教會學校各屬基督教不同教派，而且創建已久，並有相當聲

望，三合為一，談何容易。再加時局變化，更增難度，聯合大學計劃無法實現。

當時學校大權仍在差會手中，差會並沒有因為學校已經立案而放棄它對學校的控制，相反是加緊了。由於學生的課外活動的開放，在短時間內，學生組織了不少學會，如經濟學會、政治學會、新聞學會、物理學會、化學學會、讀書聯誼會等二十個左右組織。在各種學會組織的基礎上，1947年下半年，學生們開始醞釀組織全校的學生會。在召開成立大會之前，發生了風波。當時所有學會除政治學會外，都由進步學生掌握，政治學會分成兩派，選舉時，競爭相當激烈。父親思想開明，支持學生通過民主方式選舉。

1947年，內戰風雲，通貨膨脹，政府官員腐敗，引發各地學生運動迭起。強勁的學運風暴沖破了一向以不問政治出名的聖約翰大學的大門。父親意識到時代的潮流，把學生關在校園內，不問校園以外的事的時代已經過去。學生會主席和代表經常找校長提各種要求。校長定期和他們促膝談心。父親崇尚民主，認為建立民主秩序，必須有言論自由。他不斷引導學生，而不是以勢壓人。他經常在交誼廳或我家一樓和學生們舉行會談。大家無拘無束地向他敞開真實思想。他言辭懇切，真誠坦率，以婉轉的語言提醒學生要善於組織活動，注意保護自己，因而贏得學生的信任和愛戴。

全國的學潮一浪高過一浪。1947年5月，學生的罷課、示威、請願活動遍及全國。5月20日，武漢發生了國民黨軍警槍殺武漢大學學生的慘案，激起全國學生的憤怒。當時聖約翰大學尚未正式成立學生會，臨時組織了武漢大學慘案後援會。1947年學生會成立，學生活動日益增多，活動的政治目的也日益明顯，校際聯繫也日益緊密，學生運動力量不斷壯大，引起差會方面的不安。

學生運動的高漲，國民黨鎮壓愛國學生的手段也越來越厲害，經常在大學內任意抓人。1948年1月29日，又發生了同濟大學事件。²教

會認為校長對學生沒有嚴加處理，極為不滿，學生敢膽大妄為，是校長縱容的結果。聖公會上海教區主教羅培德（W. P. Roberts）給紐約教區彙報的信中明確提出有必要另找校長。

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和差會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父親忍辱提出辭職。校長辭職佈告張貼後，引起校內一片震動。

沉重的十字架

父親辭去聖約翰大學校長職務的消息很快傳到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如獲喜訊。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總幹事的職務空缺已久，父親和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以下簡稱青年會）的淵源很深。早在二十年代，他在南京東南大學和上海滬江大學任教的時候，曾擔任過青年會的董事。

父親身為基督徒，是一位在學生中享有威信的教授，業餘在青年會擔任工作深受讚賞。他是個科學家，又是基督徒。外國朋友稱他為基督徒科學家（Christian Scientist），他稱自己是科學的基督徒（Scientific Christian）。他積極參與青年會工作是為借助宗教，鼓勵青年吸取現代文明，以科學為基礎，改變封建傳統，建設現代文明國家。

他走出聖約翰大學的大門，踏進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大門，從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1948年9月中旬，北美青年會邀請他到美國訪問，並考察北美青年會工作。他先訪問加拿大，然後訪問美國各地。此時，中國的局勢正在經歷急劇的變化。1949年1月中旬，他乘船取道香港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作為一個宗教團體的領導人，他不能不想到青年會的命運以及共產黨執政後，宗教在中國將面臨什麼樣的考驗？青年會過去和美國關係很深，部份經費來源依靠外國。青年會員面對現實，參加政治學習後，紛紛離開青年會，爭取入團、入黨的會員必然和青年會劃清界限。青年會在新中國建立後還想有所發展是不可能的。但當時許多

基督教人士認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內容能夠，也必須和新民主主義相結合。於是，父親和一批宗教界人士紛紛出動，到許多地方宣傳新中國的宗教自由政策。1950年5月，周恩來總理明確表示新中國保證宗教自由，然而基督教必須在內部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聽了周總理的講話，父親對中國的基督教會的前途抱樂觀的態度，對青年會的前途更抱有希望，因為青年會不同於一般宗教團體，它致力於社會服務，深得國民好評。

抗日時期，青年會會員投入大量的救亡工作；解放戰爭時期，青年會在國民黨統治區以各種方式支持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學生運動；特別是上海青年會為中共地下黨提供了活動場所。青年會為它的青年幹事爭取獎學金到美國深造，實際上它送出去留學的那批幹事是中共地下黨員。這幾位到美國留學的幹事才華出众，在美國深受青年會國際委員會的高度評價和讚賞。日後，他們成為新中國出色的國際活動專家，難怪周總理要向青年會表示感謝。

周總理接見後，中國基督教領導人發起「三自愛國運動」即「自治、自養、自傳」。中國和美帝國主義斬斷羈絆迫在眉睫。九月，由吳耀宗先生起草的「三自宣言」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第一版。中國基督教領導人分別到各地宣講「三自宣言」。父親到了金陵女大、南京青年會等地宣傳愛國愛教，中國基督教會只有自治、自養、自傳才有出路。

朝鮮戰爭的烽火燃起，殃及到和美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中國基督教界是必然的趨勢。中國基督教界必須不遺余力對美帝國主義口誅筆伐，在內部肅清它的影響，挖掘它的代理人。1951年4月，父親出席了「三自運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基督教集會。大會支持政府政策，響應抗美援朝，擁護土改政策。會後，揭開了各地教會控訴鬥爭的序幕。各地的宗教團體、教會大學、醫院，凡是和教會有關的單位控訴美帝國主義的罪行的集會和遊行如火如荼，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震耳欲聾。

我父親過去和美國教會有密切關係，母親是美國人。解放前夕，父親還去過美國，這些客觀條件，把他列為需要交代的重點分子，自不在話下。他清算自己幾十年來和美國教會的關係，控訴美帝國主義在解放前利用青年會的陰謀，當然他不敢提及青年會也為中共地下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活動場所。他從根子挖起，檢討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從小在教會學校上學，兩次留美，前後共七年之久，一直和教會保持密切關係。批判他親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會的錯誤思想。

1950年2月底，他曾和廣州青年會總幹事王以敦先生同去香港和北美協會代表討論中國青年會三年經濟自養計劃。實際上，這次去港是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由父親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的名義去執行一項任務，由於任務性質有特殊性，當時不便公開活動內容。後來得知，當時青年會在香港有一筆外匯，要父親親自去收回，因為建國初期，中國需要外匯。這些都是他主動交代的。他滿以為把事情交代清楚，從此可以輕裝前進，但是所有他的交代日後卻成了一次又一次攻擊他的砲彈。

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開始，父親被打成「大老虎」，大會小會連番批鬥他。他因過度緊張導致胃出血，大口吐血。批鬥會派人硬把他從床上拉到會場上，在會上指控他和帝國主義分子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父親在人格上受到極大的侮辱，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他聽從家人的話，支撐下來。青年會搞運動的當權者，仍不罷休，把他和副總幹事江文漢先生兩人關在辦公室內，勒令交代。

在這一沉重打擊之後，父親情緒消沉。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接見了他，鼓勵他向前看，並把自己在黨內曾經受過委屈的事告訴他。母親希望他早日離開青年會，遠離那幫人。他請求辭職，但上級出於統戰的考慮，沒有同意。他名義上還是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實際上青年會的事務由不得他了。青年會成為民主青

年聯合會的一個成員。

作為政協委員他經常有機會到各地參觀，他看到祖國的建設和進步，他慶幸自己還有一份力量貢獻給國家，那就是重返教育園地去精耕細作，為國家培養人才。他的老友陳鶴琴先生在江蘇省負責教育部門工作，1954-1955年，聘請他到南京師範學院教物理，1955-1957年，在蘇州師範學院教物理。他不辭勞苦，每週往返在滬寧線上，但又能和學生在一起，帶領他們在實驗室裡操作，心情很舒暢，把過去的事置之腦後。

短暫的寧靜

1957年，他被調任上海師範學院物理系主任。基本上脫離了青年會，搬出青年會的宿舍。六十年代初，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把他的家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但他還掛著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的職務，他仍坐在這個位子上，是向全世界說明，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仍然存在，基督教青年會畢竟是個世界性組織；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外宣傳的一個窗口。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一個無黨派民主人士。

經過57年反右派運動，58年大躍進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幾番折騰，全國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父親也越來越沉默寡言，整天埋頭工作。他唯一的願望是把餘年貢獻給教育事業，在有生之年多培養一些人才。

在劫難逃

誰知好景不長，事與願違。1966年，文化大革命把他從講臺上拉了下來。忽然間，學校裡出現鋪天蓋地針對他的大字報。大字報揭發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國基督教內的特務。學校裡的「革命小將」立刻對他採取行動。前奏是抄家。



家裡來了一批紅衛兵。把父親打了一通，老先生是個溫文爾雅的人，任他們打，悶聲不響。緊接著是對父親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由於受不了人身侮辱，他趁上廁所的機會，用剃刀割頸上的動脈。被發現時，他已大量出血，昏倒在地上。學校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他醒來之後，萬念俱灰，沒有活下去的願望。經學校同意，他出院後回家養病。從此，他終日緊鎖雙眉，確實活得很勉強。不久，他又得了一次小中風，行動困難，說話聲音很弱。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接連有人跳樓自殺。1969年母親被遣送回家的同時，父親則被送到香港路59號「上海市基督教界學習班」³，所謂學習，實際上是一種鬥爭。

參加這次學習班的有基督徒二百人左右。大部份人晚上可以回家，重點分子不準回家。地下室臨時用書架隔開，給每個「牛鬼蛇神」夜間住宿的一席之地。監管這一批人的是上海市黃浦區工宣隊進駐基督教界的小分隊。學習班的會上，三自愛國運動的某些人聲嘶力竭叫父親交代和美帝國主義「不可告人的勾當」。

1969年11月，父親被關進在漕溪路上的前上海市少管所。當時這個少管所，已被空軍部隊接收，專門囚禁重要的政治犯。在嚴厲的逼供之下，他的精神徹底垮臺，承認了誣告他的罪名，但又苦於編造不出具體內容，痛苦折磨著他，無法解脫。

1970年，春節過後，我到了上海，費了一番轉折，獲准見父親一面。見到父親那一剎時，我楞住了。在我面前的是個穿著破棉衣，面容憔悴，毫無表情。目光痴獃的老頭。父親望著兒子發獸，說不出話來。

1970年5月，母親最後一次獲准給他送食物去。這時候，他們只有三十五元的生活費，她自己生活水平已降到最低水平。

後來，整整兩年多沒有父親消息，母親心中起了疑問。1972年初，她先後走訪、寫信給

有關單位，從未得到一個字的答覆。其實父親早被關進了監獄，前次家屬要求見他，是把他從監獄裡帶到香港路來會見的。他連續幾年的冬天，他都患肺炎，住進離家只有兩站路的華山醫院，但從不讓家屬知道。他們把他當作「要犯」放在單人病房內，門口有解放軍把守。

1972年，國際形勢有了變化，美國尼克松總統的來訪，打開了中國這扇封閉了二十多年的大門。中美關係開始解凍，9月，我到國務院來訪處反映情況，要求了解父親的下落。11月23日，這一天正巧是感恩節，母親突然接到通知，叫她到香港路學習班的地點去接父親回家。父親事先並不知情，車子經過他家的弄堂口，又把他送到香港路，他身子涼了半截，以為又將面臨一番批鬥。原來那幫人怕家屬知道他是從監獄裡放出來，所以繞了一大圈子，故意把他先送到香港路學習班的地點，然後讓母親把他接回家。

回家後，父親的心始終沒有得到安寧。還沒有平反的機會。每月他仍然只拿35元的生活費，學校裡沒有一個人來探望他。在他回家之後，精神失常的表現越來越明顯。送他去上海精神病院就醫，證實他患有精神病。家屬一再要求給他做書面結論，解除他思想上的負擔，有助於他的疾病的治療。

1973年，春節前，上海師範學院終於來了兩位代表，奉上級指示，向他作口頭宣佈。這種口頭宣佈，任何時候都可以不予承認。他們離開時還帶威脅性的口吻不准把囚禁的情況洩露。他的疾病日益惡化。事實上，我們作為子女，一直想了解他被隔離時的遭遇，老人總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說，斷斷續續，得知他是被監禁在牢裡，受過拷打，帶過手銬。以後和他同時監禁在少管所的林永悞先生（林則徐的第五代孫，父親的一個學生）透露說：「由於涂老晚上哭、喊、呻吟，大冷天晚上，罰他帶上手銬站在露天，以至於得過幾次肺炎」。儘管母親和我在上海的姐妹對他多方精心照料，給他之間的溫暖和愛，深情地勸他安心養病。但他

的問題一日得不到解決，他一日不安，病也治不好。反人性的誣陷和背叛，使他被損害和被侮辱的身心崩潰，無法修復。

1975年夏，他又患肺炎，氣管被痰堵住，不能正常喘氣。醫生要切開氣管，插入管子把痰吸出，他央求醫生，不必搶救，費勁地吐出幾個字：「讓我走吧！」。醫生給他動了手術，以後幾個月，他一直住在華山醫院，再也沒回過家。他眼巴巴期待還他清白的願望落空了。1975年9月11日中午，他帶著心靈深處的創傷離開人間。

從父親去世後到1979年，整整四年，為了父親還以清白，我們四個子女四出奔走，雖然遇到種種阻擾，但我們決不罷休。作為父親的專案組長李某某當然不願痛快地承認這是個錯案。我們兄弟姐妹四人費盡周折，得到了一張紙，上面寫道：「由於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認為涂羽卿同志作為美特嫌疑而立案隔離審查是錯誤的。所謂基督教美特潛伏組織是一起假案，應予否定。」這張紙對逝者，已無意義，但對活著的略有安慰。可是歷史的傷痕已無法彌補。

1979年11月2日，上海師範學院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平反昭雪的儀式，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母親從不贊同任何殯葬儀式，但這次破例，因為這不是單純的骨灰安葬，而是為父親平反昭雪，讓她子女解脫苦惱。在她心中，無論是平反還是不平反，父親永遠是個坦蕩的君子。我們一家三代人、父親生前好友及其子女，同事、學生，鄰居前來送花致哀。母親唯獨謝絕了四個人的花圈，她不願這四個名字在父親靈前出現。她相信父親在九泉之下看到這幾個人的名字會有極大的傷痛。父母親多年的老鄰居周谷城教授親切地用英語對母親說：「你的丈夫是個正人君子，是個真正的基督徒。」母親含淚驕傲地回答：「是的，他愛國、愛家、愛學生、愛朋友，他撒向人間的一片愛心永留我們心間。」

父親雖入土但未安。